

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研究^①

万晓宏 黄伟帆

〔内容提要〕在跨文化交流环式传播模式中,国际学术组织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成为本国文化的译者;二是提供文化传播的媒介;三是培育对象国文化的译者。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历经诞生与发展时期、困顿中求生存时期、中断与改革时期和恢复与华合作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最终形成访问学者及博士生培养项目、亚洲研究会议、学术出版及图书馆建设等三项品牌活动。从跨文化交流视角出发,哈佛-燕京学社不仅积极发展美国汉学研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而且利用强大的校友网络,培育中美沟通的友好力量,并且通过构建学术共同体为两国人文交流提供平台。尽管目前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还存在若干局限,但以其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组织在促进中美跨文化交流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方面仍大有可为。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 哈佛-燕京学社 跨文化交流 文化外交 中美关系

①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互动研究(1979~2021)”(项目编号:21BGJ055)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美国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复杂演进,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建构主义认为,通过国际移民、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载体,不同文化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实现价值观念的共享,从而建构起共有观点,弱化身份差异,最终帮助国家间化解矛盾和冲突。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导致中美关系持续动荡。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外交上抹黑中国,在经贸科技上打压中国,在军事安全上围堵中国。相对而言,人文交流具备低敏感性与低政治性的特征,是新时期维系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其中,一些国际学术组织通过“二轨外交”机制,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为中美两国民众建立个人联系,消除文化误解,可以很好地补充官方层面文化交流的不足。

作为跨国学术组织,哈佛-燕京学社自诞生之初便承载着促进中美跨文化交流与文化研究的重任。在与中国大学合作初期,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通过支持美国学者到访中国等方式,将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理念传入近代中国,推动西式文化与汉学的交流与碰撞,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桥梁作用。1952年在华合作项目中断后,哈佛-燕京学社把合作范围扩大到整个亚洲,其合作方式也相应调整。1979年,中美建交后,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大学及研究机构重新恢复合作关系,并陆续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尽管哈佛-燕京学社强调活动的纯学术性,但不同文化仍然随着访问学者项目、图书出版活动以及学术会议的开展而实现了跨国交流,形成了文化观念的互构。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哈佛-燕京学社都以其独特的身份和角色,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交流合作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未来工程”。^①但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哈佛大学被迫停招国际生和撤销其“学生和访问者项目”(SEVP),严重阻碍了两国正常的人文和学术交流。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跨文化交流视角重新解读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历程、其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可以为中美关系乃至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也是新时代畅通中美关系“二轨外交”的重要课题。然而,目前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主要从历史学和图书管理

^① 《习近平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雷波列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见: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5869.htm 2025.5.20。

学的视角出发,较少立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探讨学社依托跨文化交流实践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

正值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即将 100 周年,本文基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文献、官网文件以及笔者在学社访学的亲身经历和访谈资料,试图厘清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与中国重启合作后哈佛-燕京学社的核心学术项目及其运行特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揭示哈佛-燕京学社在促进中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为今后消弭中美错误认知、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提供历史参照与现实启示。

一 跨文化交流理论和分析框架构建

(一) 跨文化交流理论

美国传播学学者拉里·A·萨姆瓦(Larry A. Samovar)将“跨文化交流”定义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沟通与交流。^①跨文化交流理论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在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交往时,需深入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在高效沟通与互动中推动文化和谐与共进。因而,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在于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从而建立起跨文化适应。文化作为一种符号,需要在人们的传播活动中才能得以继承和发展,^②而影响跨文化传播效果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是发送者、接收者以及编码信息。^③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催生着不同的文化身份,个体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事实上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主体角色。因此,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具有先决性。人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在彼此分享、探寻共同的文化价值,^④抑或是出于固有思维模式和道德标准的限制而形成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因此,跨文化交流会形成两种互构模式,即文化适应或者文化冲突。从这一层面来说,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存在理论契合点。建构主义强调,

① 拉里·A·萨姆瓦、理查德·E·波特、雷米·C·简恩著《跨文化传通》(陈南、龚光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

② 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载《外语学刊》,2000年第1期,第88页。

③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页。

④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06~107页。

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互动实践中会构建起“自我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但由于信仰内容、偏好和认知的不同，“自我”和“他者”的区别也会同时被建构起来，进而影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①因此，化解冲突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各行为体的共有知识，把敌人身份转变为朋友身份，^②而作为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综上所述，跨文化交流理论和建构主义一样，都强调跨文化交流对建构共有观念的重要性。但目前跨文化交流理论多运用于跨国移民、跨国企业、影视音乐等主体，对国际性学术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研究较少。

（二）跨文化交流作用机制的建构

构建跨文化交流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了解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过程。根据美国传播学教授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提出的环式传播模式，可以发现跨文化交流涉及两大主体(发送者和接收者)和两次文化转译过程。^③发送者对本国文化的自我理解以及文化编码是第一次文化转译过程，对象国的接收者根据自身价值观、知识面和思维方式对文化进行解码则是第二次文化转译过程，与此同时接收者也会对接收到的文化信息进行文化反馈，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单次闭环。在这种传播模式中，文化发送者同时也是接收者，不同文化在同一时间段内可以相互影响、多线交流以及不断互构。

在此基础上，可以从发送者、传播路径和接收者三方面发现国际学术组织的跨文化交流作用。

第一，成为本国的文化译者。跨国学术组织从事对外文化交流时往往具备极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使它们在特定文化领域具有深厚的积累和研究，能够提供更准确、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海外汉学研究机构、国际学术联盟、跨国高校合作平台等跨国学术组织，可以借助学术研讨会、专题论坛、文化研习营等受众广泛的形式，将本国文化内涵编码为全人类共有的理念

① 信强、倪世雄《行为“身份”与对外政策：美台关系的建构主义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第23页。

② “共有知识是相对自有知识而言的。自有知识是指个体行为体持有的而他者没有的信念，国家的自有知识来自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国内因素，可以成为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因素，是研究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参见谈东晨、钮维敏《公共外交原理：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的阐释》，载《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4期，第74页。

③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8页。

标准,降低文化误解,提高接收国的文化接受率,打造文化认同。

第二,提供文化传播的媒介。首先,跨国学术组织受到政治波动影响相对较弱,易形成稳定的文化交流常态化机制。例如不具备政治色彩的跨国学术组织在政党更替和武装冲突频发的地域,能够成为跨文化交流稳定且重要的渠道。其次,相较于政府机构,跨国学术组织在运作模式上通常更具灵活性,能够快速适配外部环境变化并及时调整交流策略。这种灵活性使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能够快速响应学术研究前沿动态与受众的实际需求,持续优化交流内容的学术深度与呈现形式,有效提升文化传播的实际效能。最后,跨国学术组织的核心议题涵盖跨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合作、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社科交流等关键领域,其开展的多元化文化学术活动,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知本土文化的核心内涵,进而推动不同文化间的深度交流与有机融合。

第三,培育对象国的文化译者。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纷争,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往往容易被曲解或泛政治化。^①与之相较,国际学术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政治敏感性更低,而且直接对接当地学界精英与普通民众,深度嵌入当地社会基层场景,能够有效降低跨文化沟通中的信息损耗与信任建立成本,潜移默化地影响对象国民众的文化认知,进而引导、激励其主动成为本国文化的传播者与跨文化译者。另一方面,国际学术组织是培育跨文化交流人才的核心平台。例如,部分跨国学术交流机构联合高校发起的国际学术会议、学者访学项目及科研合作计划,为各国学者提供了实地考察、深度研习的资源与契机,助力其精准理解并融入本土文化语境,从而培育出更多兼具双重文化背景、具备跨文化传播意愿与能力的他国文化译者。

因此,在跨文化交流环式传播模式的基础上,国际学术组织的文化交流作用机制得以构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学术组织文化交流作用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政治化,成为一种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文化帝国霸权服务的外交政策手段。当前已有诸多文献从“文化外交”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富布莱特项目以及美国“和平队”等非政府组织对中国进行的文化输出,然而较少关注以哈佛-燕京学社为典型代表的国际学术机构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哈佛-燕京学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创

^① 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54页。

立之初就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作为致力于推动亚洲研究和中美历史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是当今探析跨文化交流作用的典型案例,也是维系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 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历程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距今已有98年历史。自建立之初,哈佛-燕京学社就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紧密联系。为了得到霍尔遗产捐赠,哈佛-燕京学社顺应中国民族主义浪潮,采取与中国教会大学合作的方式,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工作方向,并侧重以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在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下,哈佛-燕京学社迎来黄金发展十年。而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大学教学活动几乎陷入停滞。受此影响,哈佛-燕京学社在困顿中求生存,在曲折中谋发展,仍然为中国教育事业和文化研究做出一定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禁止任何国内资金流向中国,哈佛-燕京学社无法再继续与中国大学进行合作,其在华项目被迫中断。最终哈佛-燕京学社将合作对象和研究范围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直到1979年,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大学等教育机构才恢复正常合作关系。整体来看,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诞生与发展时期(1928~1937年)、困顿中求生存时期(1937~1945年)、中断与改革时期(1945~1979年)和恢复与华合作时期(1979年~)。

(一) 诞生与发展时期(1928~1937年)

美国化学家、美国铝业公司(ALCOA)的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在1914年去世后留下30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霍尔生前就已投身于国际传教运动和慈善事业。霍尔立下遗嘱,规定其遗产的三分之一用于支持在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开设有宗教课程的教育机构,且该教育机构需要由英国人或美国人组成的理事会掌控。^①此后,霍尔遗产委员会(The Trustees of the Hall Estate)开始物色

^① Harvard University, "Charles Hall", available at: <https://ealc.fas.harvard.edu/charles-hall>, 2025.5.20.

合适的受助机构。

彼时的哈佛大学急需大量资金来支持其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根据霍尔的遗嘱,遗产需要用于美国之外的地区的教育事业,因此美国所有大学都不具备受助资格。^①为争取霍尔的教育基金,哈佛大学提出与中国境内的一所大学合作成立研究机构或学社,研究东方文明,发展对中国艺术和考古等人文科学的教育研究。上述方案得到霍尔遗产委员会认可,哈佛大学于1925年派出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前往中国寻找合作对象。经过筛选,1919年成立的燕京大学成为哈佛大学的拟定合作对象。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校长的带领下,燕京大学不仅吸引中国人加入学校教师队伍和领导高层,弱化校园内的外国色彩,而且积极向临时政府申请立案注册,推动燕大中国化。^②燕京大学争取到与哈佛大学合作的机会。经过数次谈判和院校合并后,燕京大学正式成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合作伙伴。最终历经近3年的筹划,哈佛-燕京中国研究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于1928年初正式成立。^③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初就明确其发展目标:研究中国、日本、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历史文化;资助中美知名学者开展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与中国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开展中国文物的挖掘和考察工作;等等。^④在获得霍尔教育基金的资助后,哈佛-燕京学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商定,哈佛-燕京学社设立三个委员会:一是具有最高决策权的哈佛燕京理事会;二是提供教育路线和政策指导的教育委员会;三是具体负责北京燕京项目开展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洪业、丁文江、孔祥熙、周诒春、颜惠庆等五位知名的中国教育家和学者。^⑤在他们的指导下,哈佛-燕京学社的在华项目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积极引进西方研究方法,为中国本土学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健全了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在10年

① 樊书华《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第80页。

② 曹金祥、冯春英《中国化、世俗化与世界化:司徒雷登的大学教育观》,载《大学教育科学》,2018年第1期,第100页。

③ 樊书华《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92页。

④ 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5页。

⑤ 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76页。

黄金发展期,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开展的项目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选取中国的五所教会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与燕京大学一起构建起中国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①并为上述6所大学表现优异的本科生提供前往哈佛留学进修的机会。丰厚的资金支持也为这些大学培养了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第二,助力中国近代汉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许多美国年轻学者赴华进行汉学研究,并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出版《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成为后世汉学研究的重要工具;^②另一方面,哈佛-燕京学社针对中国的人文学科设立众多项目,例如在燕京大学建立东亚系,并增设中国日本古代史、考古、宗教、农业史等新课程,成为名噪一时的人文中心,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第三,发展中国图书出版和博物馆典藏事业。洪业曾担任燕大图书馆馆长一职,在他的带领下,不仅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馆藏得到扩大、完善,而且以《燕京学报》为代表的中国出版事业在学社资金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水准也得到极大完善和提高。^③

总之,1928年成立以来,哈佛-燕京学社围绕组织宗旨开展一系列发展汉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的学术活动。在这一阶段,哈佛-燕京学社更多发挥着自上而下的援助者作用,以“西方科学方法”培育中国近代的人文学科体系。而中国在一批知识分子的带动下积极回应哈佛燕京的合作项目,本土的人文研究在封建王朝统治结束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此时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也开始凸显。

(二) 困顿中求生存时期(1937~1945年)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内忧外患之下,哈佛-燕京学社日常活动的开展遭到阻碍。中国多数的教育机构被战事破坏、摧毁。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风雨飘摇。为了存续力量,当时中国高等院校(包括教会大学在内)发起一场内迁运动,将师生及部分教学资产迁至较为安定的西南地区。其中,与哈佛-燕京学社有合作关系的岭南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

① 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第82~90页。

② 张凤《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载《文史哲》2004年第3期,第60~63页。

③ 魏泉《洪业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以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的考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100~102页。

学、福建协和大学等院校都经历了数次内迁。^①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教会大学不仅无法因美国标签而得到庇佑,反而遭到日军更为严重的破坏。例如金陵大学在抗日战争中不仅损失高达 10 万余元的财产,而且师生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②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包围、占领燕大校园,并拘押了 30 多位教职人员和学生。^③ 中国高校的内迁运动在特殊时期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积攒了力量,但师生居无定所,校园正常教学活动遭到破坏。燕大校园变故也使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开展的项目一度无法继续推进。此外,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资救助的图书也流散于战火之中。

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教育界成为中国统一战线中的中坚力量。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也迸发出新活力,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发展迎来新转机。战争危机不仅让中国人意识到民族存续的重要性,也使挖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成为高等教育的新课题。对此,哈佛-燕京学社及时调整在华项目,重点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系列援助,客观上对中国大学的生存发展以及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哈佛-燕京学社的主要活动及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增加对合作院校的资金援助,帮助中国大学渡过难关。在战争时期,中国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内迁之后,由于资金问题,许多大学教研人员的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日常教学活动更是处于停摆状态。对此,哈佛-燕京学社理事会不仅同意将援助范围扩大至 13 所教会大学,为其迁移、复学和教研提供救助,而且放宽了特殊时期合作大学使用专项基金的条件。^④ 可以说,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对保障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性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参与中国古籍救援与藏馆建设工作。战争爆发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打击巨大。许多藏书被炮火摧毁,能够随大学内迁的图书不仅数量少,而且由于长途奔波,古书的折损率也很高。尽管如此,中国仍有一批致力于拯救图书事业的大学与师生。哈佛-燕京学社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不仅支持教会大学

① 刘韦《抗日战争期间我国高校内迁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2~22页。

② 转引自刘韦《抗日战争期间我国高校内迁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页。

③ 覃红霞《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探析》,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6页。

④ 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第132~136页。

购置私人藏书和地方志,完善中文图书馆藏,而且为中国大学订购外文汉学书籍提供便利。^①

第三,促进中国西部的文化研究。中国大学的内迁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各大学团结力量继续开展人文研究,而且因地制宜地将研究重心转向考察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哈佛-燕京学社理事会针对表现突出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科研人员及其团队,设立5000~10000美元的人文项目救助金,^②为该领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也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因此尽管受战时环境的影响,哈佛-燕京学社的在华项目进入困顿时期,但是哈佛-燕京学社及时调整了活动方针,抓住了战局之下的新转机。总体而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这段时间内,哈佛-燕京学社在困顿中求生存,在曲折中谋发展,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文活动做出重要贡献。

(三) 中断与改革时期(1945~1979年)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内战时期。由于持续的战乱以及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哈佛-燕京学社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受通货膨胀和内乱的影响,中国大学回迁之旅异常艰难。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与国家建设需求,确立了“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的方针,要求各大学重点发展科学与技术的课程,^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高等院校恢复人文学科的进程。因此,即使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教会大学的人文学术活动和校园重建工作也无法正常开展。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亲蒋政策引发大学学生强烈不满,反美浪潮使哈佛-燕京学社的项目难以开展。此外,在这一阶段,出于主客观原因,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进程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哈佛-燕京学社与教会大学的合作被认为存在文化帝国主义的风险。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教会大学展现了一定的政策灵活性,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对立达到巅峰,哈佛-燕京学社和教会大学

① 周旃《时困犹存劫后书: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活动》,载《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1期,第63~65页。

② 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第138页。

③ Jun, H. Y. & Seng, T. C.,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1937~1945.”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Review*, Vol. 6 (2022), pp.189~190.

失去生存土壤。1950年12月17日,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完全禁止任何资金流向中国,加速教会大学中国化的进程。同时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在1952年底通过合并、重组等方式,全面接管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①随着合作大学全部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合作项目正式中断。

此后,哈佛-燕京学社挂靠到哈佛大学名下,霍尔教育基金维持着学社的运营发展。哈佛-燕京学社也开始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高校进行合作,致力于促进亚洲学者之间以及亚洲学者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1954年以后,哈佛-燕京学社开始为东亚、东南亚地区顶尖高等院校的优秀学者与青年教师提供全额研究资助或奖学金支持他们前往哈佛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研究。^②至此访问学者项目(Visiting Scholar Program)成为哈佛-燕京学社的核心项目。该项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哈佛大学的亚洲研究,并且带动了美国各大学开设亚洲研究的相关课程。尽管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的合作一度中断,但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始终都是哈佛-燕京学社的亚洲研究无法绕开的国家。因此,它一直积极寻求与中国进行对话沟通,争取早日恢复正常合作关系。

(四) 恢复与华合作时期(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改革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1978年,党中央提出要振兴高等教育,加强科学研究工作,^③为教育体系重建和对外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彼时中国存在发展教育的客观需求,美国也希望利用教育交流践行文化外交战略,两国对推动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都展现出强烈意愿。^④在此背景下,1979年哈佛-燕京学社恢复了与中国大陆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⑤时

① 范惠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综述》,载《高等农业教育》2002年第1期,第14页。

② Li Ruohong,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8 (2017), pp. 88~89.

③ 王胜今、赵俊芳《中国高等教育60年历程》,载《现代教育科学》2009年第3期,第36页。

④ 胡中波《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4~116页。

⑤ Elizabeth Perr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vailable at: <https://uscnpm.org/2022/11/21/the-harvard-yenching-institute-past-present-and-future/>, 2025.5.20.

隔 28 年,哈佛-燕京学社的与华交流合作项目重新起步,并得到快速发展。

三 哈佛-燕京学社的主要活动及其特点

在中断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后,哈佛-燕京学社迎来了组织发展的关键转变期。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任社长时期,哈佛-燕京学社逐步将合作范围拓展到东亚、南亚地区,尤其注重与日本、韩国保持联系;合作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教会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在 1979 年与中国重新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充足的资金和人脉,调整与华合作模式,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活动,并且开展系列访学项目,助力中美人文社科领域的交流。

(一) 哈佛-燕京学社的日常运行

作为独立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与哈佛大学并不存在组织上的附属关系,二者在法律地位、财产管理上互不干涉。为方便管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管理权于 1976 年由哈佛-燕京学社移交哈佛大学图书馆,但馆藏图书的所有权依旧掌握在哈佛-燕京学社手中,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人员均可免费使用图书馆资源。^①此外,哈佛-燕京学社保留对《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管理权。

自成立以来,哈佛-燕京学社共有八任社长(如表 1),分别是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赖肖尔、裴泽(John Pelzel)、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韩南(Patrick Hanan)、杜维明(TU Weiming)、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和罗柏松(James Robson)。

表 1 哈佛-燕京学社历任社长基本信息

社长	任期(年)	社长研究方向	学社工作重心
叶理绥	1934~1956	远东研究、日本研究	中国汉学研究
赖肖尔	1956~1964	日本及东亚的历史文化	日韩历史文化研究
裴泽	1964~1975	日本政治与社会结构	东亚历史文化研究
阿尔伯特·克雷格	1976~1986	日本近代史	东亚研究领域和亚洲高等教育
韩南	1987~1995	亚洲文化、中国汉学	中国和亚洲文学

^① 参见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76-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1976-Agreement.pdf>, 2025.5.20。

杜维明	1996~2008	中国儒学、宗教哲学、神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裴宜理	2008~2024	汉学、中国政治	东南亚、南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
罗柏松	2024~	中国宗教、东亚文明	待观察

资料来源: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isto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istory-of-the-harvard-yenching-institute/> 2025.5.20 2025.5.20。

目前哈佛-燕京学社的日常工作人员有社长罗柏松、副社长李若虹(Ruohong Li), 以及行政人员苏珊(Susan Scott)、林赛(Lindsay Strogatz)、弗朗西斯(Francesca Coppola)、詹姆斯(James Flaherty)等。以上数人负责学社的日常运行和系列项目的开展。哈佛-燕京学社理事会拥有最高决定权, 由9名理事组成, 其中3名来自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3名来自哈佛大学, 另外3名是具备亚洲研究经验的非执行独立董事。此外, 学社还设置了教职顾问委员会和图书馆顾问委员会, 前者是学社社长的非正式顾问小组, 为学社运营和学术方向提供一般性建议。^①

(二) 哈佛-燕京学社的主要活动

哈佛-燕京学社的组织宗旨为: 致力于推动亚洲人文学术研究和发 展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围绕这一组织宗旨和目标, 哈佛-燕京学社开设了访问学者项目, 并为亚洲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 资助亚洲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相关刊物的出版。可以说, 哈佛-燕京学社在保持创立初心的基础上, 顺应时代变化, 形成了访问学者及博士生培养项目、亚洲研究会议、学术出版及图书馆建设三项品牌活动。

1. 开设访问学者及博士生项目

自1954年起, 访问学者项目就成为哈佛-燕京学社的核心项目。与初期直接资助教会大学的合作模式不同, 访问学者项目旨在从亚洲大学内筛选出具备科研潜力的学者前往哈佛-燕京学社以及哈佛大学进修, 并为其提供奖学金和生活补贴。这一落实到个体的合作模式, 既有利于人员管理, 也可以保证援助的质量。1979年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恢复合作关系后, 访问学者项目也陆续推行至中国高校, 培养了一批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英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等27

^① 参见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Govern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governance/>, 2025.5.20。

所中国(含港澳台)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了合作关系。截至2024年,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及博士生项目累计培养了536名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专家(见表2),与中国高校共同打造了一张涵盖政治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术网络,促进了中国及亚洲人文领域研究的发展。

除了针对国内学者设立访问学者项目,哈佛燕京也十分注重博士生的培养,为人文学科领域发展积蓄新生力量。与20世纪30年代的联培模式相似,如今哈佛-燕京学社依旧为表现优异的博士生提供奖学金以及前往学社进修的机会。当前学社设置五项针对博士生的培养项目,包括印度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India)、中国的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 in China)、博士生联培项目(Joint Doctoral Scholarship Program)、东亚地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 Fellowship Program)以及高级培训项目(Advanced Training Programs)。其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等9所高校的博士生有资格报名印度研究项目,经过面试考核即可赴哈佛-燕京学社从事一年的印度研究。

作为致力于促进东亚研究和中国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国学者提供前往哈佛大学开展研究、交流学术经验以及扩大国际视野的机会,促进了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博士生项目也为亚洲文化研究提供了储备人才支持,凸显了学社超前的人才培养意识。

表2 中国历年参加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及博士生培养项目的人数

年份	人数(人)	年份(年)	人数(人)
1979	2(港澳台各1人)	2002	22(含港澳台6人)
1980	6(含港澳台3人)	2003	18(含港澳台5人)
1981	9(含港澳台3人)	2004	18(含港澳台3人)
1982	7(含港澳台2人)	2005	14(含港澳台2人)
1983	8(含港澳台1人)	2006	17(含港澳台5人)
1984	9(含港澳台3人)	2007	18(含港澳台4人)
1985	11(含港澳台5人)	2008	17(含港澳台5人)
1986	6(含港澳台1人)	2009	6(含港澳台1人)
1987	7(含港澳台2人)	2010	10(含港澳台1人)

1988	9(含港澳台2人)	2011	9(含港澳台2人)
1989	11(含港澳台2人)	2012	10(含港澳台3人)
1990	11(含港澳台2人)	2013	10(含港澳台5人)
1991	12(含港澳台3人)	2014	8(含港澳台4人)
1992	11(含港澳台2人)	2015	8(含港澳台4人)
1993	11(含港澳台3人)	2016	10(含港澳台7人)
1994	8(含港澳台2人)	2017	13(含港澳台4人)
1995	8(含港澳台1人)	2018	16(含港澳台5人)
1996	12(含港澳台3人)	2019	15(含港澳台6人)
1997	15(含港澳台4人)	2020	5(含港澳台1人)
1998	15(含港澳台2人)	2021	12(含港澳台4人)
1999	20(含港澳台6人)	2022	12(含港澳台5人)
2000	18(含港澳台3人)	2023	15(含港澳台3人)
2001	18(含港澳台3人)	2024	9(含港澳台2人)
合计 536 人,包括港澳台 147 人			

资料来源:访问学者人数由笔者整理得出,具体名单参见: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lumni,” available at: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role/alumni/> 2025.5.20 2025.5.20。

2. 举办亚洲研究会议

自 2011 年起,为了给亚洲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可供分享前沿学术成果和拓展研究视野的平台,哈佛-燕京学社几乎每年都会与合作大学联合举办为期 7 天至 10 天的学术会议。亚洲研究会议是高级培训项目的一部分,在该会议上表现优异的学员可以获得访学交流的机会。亚洲研究会议致力于会集亚洲地区各人文学科的专业学者,就某一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和观点碰撞,并鼓励跨学科跨地区的研究合作。亚洲研究会议的主要环节包括学术讲座、主旨演讲、研究讨论以及参观考察等。截至 2024 年 12 月,由哈佛-燕京学社牵头共举办了 25 场^①亚洲研究学术会议(见表 3),研究主题涵盖研究方法、亚洲文学、民主政治以及民族宗教等,邀请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参加,知名度高,影响范围广。

^① 经检索哈佛-燕京学社官网及公开资料,“比较与世界文学”(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研究会议仅能确认 2014 年 6 月于北京(联合清华大学)召开,官网标注的“河内场”因无时间、合作单位等关键信息且未检索到存档资料,暂不纳入统计,最终统计总场次为 26 场。

表3 哈佛-燕京学社举办的历届亚洲研究会议信息

主题	时间	联合单位	举办地点
大众文化与草根运动	2010年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2011年		
城市研究培训项目	2010年6月	华东师范大学、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纽约大学	上海
	2013年6月		上海
	2014年8月		香港
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 城市迁移与中产阶级的增长	2011年6月	悉尼大学、南京大学	南京
新民主国家的公民社会	2012年1月	高丽大学、韩国高级研究 基金会	首尔
史料与方法：20世纪50年代 中国研究的新视野	2012年1月	复旦大学	上海
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2012年6-7月	南京大学、悉尼大学	南京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2014年6月	清华大学	北京
医学人文学	2015年8月	香港大学、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北京
	2016年8月		天津
探讨中国政治的新方法	2015年6月	南京大学、中山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
	2016年6月		广州
	2017年7月		上海
十六国时期和北朝时期的佛教和民族	2018年6月	北京大学	北京
	2019年6月		北京
亚太历史与当代研究的新方法	2018年7月	早稻田大学	东京
中世纪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阿拉伯文献与研究方法	2019年6月	南京大学	南京
越南山区发展的当代挑战： 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2019年7月	越南社会科学院	河内
世界文学中的亚洲	2023年6月	朱拉隆功大学	曼谷
中国制度研究新前沿	2024年1月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2024年5月	厦门大学	福州
亚洲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从跨学科视角应对社会技术挑战	2024年6月	清华大学	北京
东南亚华人社区：历史、文化与文学	2024年12月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在亚洲构建长者友好型社会： 利用社交技术应对全球老龄化	2025年5月	清华大学	北京

资料来源: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raining Programs Held in Asia," available at: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programs/advanced-training-programs/training-programs-held-in-asia/>, 2025.12.25。

3. 资助学术出版及图书馆建设

在创立初期,哈佛-燕京学社就极其重视学术出版工作。在与燕京大学合作的 20 多年时间内,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国教会大学出版了《燕京学报》《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岭南学报》《中国文化研究刊汇》等重要刊物。^① 1936 年,哈佛-燕京学社创办《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专门刊登古典文学、古代史和中国研究的学术论文,成为亚洲研究学术成果的孵化地。^② 20 世纪 50 年代后,哈佛-燕京学社对学术出版的资助拓展到亚洲其他地区,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刊登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和泰国等国的学术文献。1994 年,在时任哈佛燕京社长韩南的建议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共同推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资助历史学、宗教学、文学等学科的年轻学者出版中文著作,现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重要的专著合集。^③ 如今,哈佛-燕京学社专门设立“哈佛燕京图书馆研究基金”,具备条件的学者不仅可以得到出版资助,还能查阅使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资料。除了重视自身图书的出版,哈佛-燕京学社还开设亚洲出版系列(Publication Series in Asia)、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丛书(Publication by HYI Scholars)以及工作论文系列三大学术出版项目,为亚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发行成果的平台和渠道。

援助建设国内外图书馆是贯彻哈佛-燕京学社发展历程的另一线索。在首任馆长裘开明(Alfred Kaiming Chiu)的带领下,哈佛-燕京学社在燕京大学设立哈佛购书处,不仅收集抗战时期散落的汉学、史学私家藏书,而且还在抗战胜利后派人前往日本找寻散佚的典籍。^④ 经过长期的发展,哈佛燕京图书馆不仅收藏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珍贵文献典籍、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学资料等珍稀文献,而且裘开明本人还开创了汉和图书分类法,将西方的图书管理方法与

① 马学良、耿兆辉、刘玲玲《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成立、影响与启示》,载《图书情报工作》,2017 年第 12 期,第 53~55 页。

② 陈滔娜《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民国时期校际合作的成功个案》,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260~261 页。

③ Li Ruohong,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8 (2017), p. 90.

④ 张翔《裘开明与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载《图书馆杂志》,1999 年第 8 期,第 48 页。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相结合,使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参考中心。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依旧在继续。哈佛-燕京学社每年都向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财政支持,用于购置新图书和基础运营。此外,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向学社校友、访问学者开放,为当下的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和文献资源。

(三) 哈佛-燕京学社活动的主要特点

基于国际性学术机构的组织定位,哈佛-燕京学社形成了有别于建立初期的活动内容和组织模式。通过梳理其日常活动,可以发现哈佛-燕京学社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合作范围已拓展到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哈佛-燕京学社的捐助者霍尔在遗嘱中明确提到希望其教育遗产用于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以及欧洲的巴尔干国家的高等教育,因而哈佛-燕京学社以致力于推动整个亚洲人文研究和高等教育作为组织宗旨。1956年,日本历史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学社在其带领下将学术伙伴关系扩展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尤其注重发展与韩国、日本的合作关系。此后,哈佛-燕京学社通过访问学者项目和博士生项目,进一步拓展朋友圈,将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度纳入学术伙伴网络。因此,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如今哈佛-燕京学社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合作范围持续扩大,进一步践行霍尔遗嘱的初衷。

第二,研究重点转向关于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不同时期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重点也不尽相同。在组织成立与发展的阶段,哈佛大学为赢得霍尔的教育基金,选择与燕京大学合作开展项目,因此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汉学的研究自然成为当时学社的研究重点。20世纪5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的合作被迫中断,其目光转向了东亚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以及韩国成为学社开展亚洲研究的新窗口。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研究和中國问题研究相关的学术交流与研究实践,在哈佛-燕京学社得以重新恢复与推进。21世纪以来,随着亚洲地区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哈佛-燕京学社开始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作为亚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印度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印度研究成为哈佛-燕京学社当下主要的研究兴趣之一。此外,对亚洲的研究始终无法绕开一个

大国——中国。因此中印人文历史、两国的互动交流以及政治实践成为当今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重点。对此,哈佛-燕京学社专门设立“印度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印度研究”的博士生联培项目,通过交换生的形式建立起跨国学者网络,助力中印研究的发展。

第三,合作理念更加公正平等。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曾致力于将“西方科学方法”引入中国研究。这一举措在推动中西方学术发展的同时,也无意间塑造了一种文化偏见,即哈佛学者及教会大学中的西方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天生就比中国本土汉学家的研究方法优越。^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哈佛-燕京学社逐渐认识到,与亚洲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交流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打破学术等级观念上:学社不再坚持哈佛大学学者的学术地位天然高于亚洲学者,也不再戴着有色眼镜开展与其他合作机构的合作。相反,哈佛-燕京学社开始采取新的策略,如举办实地培训研讨会、开展联合学位课程,并与众多独具特色的亚洲大学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这些举措不仅彰显了哈佛-燕京学社对亚洲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理解和尊重,也表明了其开展亚洲研究合作的诚意。通过一系列努力,哈佛-燕京学社正逐步消除文化偏见,构建一种更为平等的合作模式。

第四,哈佛-燕京学社活动受社长偏好影响较大。截至目前,哈佛-燕京学社共经历八任社长。由于对学社活动开展拥有优先话语权,因此社长的学术背景、学科专长和自身兴趣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学社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其个人偏好甚至会决定学社的资源分配(见表1)。例如,在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担任社长期间,哈佛-燕京学社尤其注重发展与日本、韩国高校间的关系。儒学专家杜维明在中国出生,对华友好。受其影响,哈佛-燕京学社再次将研究方向聚焦于中国大陆。在杜维明担任社长期间,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人数达到峰值。此外,哈佛-燕京学社还举办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以及儒学发展的学术会议,中美跨文化交流成果突出。而在裴宜理出任社长期间,访问学者的项目管理和制度创新成为工作重点,哈佛-燕京学社活动的国际性和

^① Elizabeth Perr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vailable at: <https://uscnpm.org/2022/11/09/the-harvard-yenching-institute-past-present-and-future/>, 2025.5.20.

学术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尽管哈佛-燕京学社的宗旨和目标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但在不同阶段其主要活动、重点关注和研究方向依旧会受到社长偏好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四 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组织宗旨围绕着学术交流展开,但文化属性依旧深刻影响着学者之间、学社与大学之间的互动模式。20世纪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开展的系列项目,推动了美国教会文化、西方科学研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20世纪7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大学和机构恢复合作关系,中西方文化再次随着学社活动的开展实现交流融合。可以说,哈佛-燕京学社的突出贡献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中美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今中美关系总体呈现对抗性,不确定因素增多。两国迫切需要达成官方层面的战略共识,同时也需重视人文交流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作为国际学术合作的重要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应继续发挥好推动中美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为今后两国求同存异、建立共识、保持良好关系夯实民心基础。

跨文化交流需要以了解不同文化的相同点和冲突点为基础,而一批乐意成为不同文化“译者”的个体则是跨文化交流开展的主要依托。纵观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致力于推进美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发展,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事实上扮演着汉学“译者”的角色。哈佛-燕京学社打造的中美学术共同体为两国跨文化互动和共有观念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传播平台。此外,哈佛-燕京学社还利用丰富的学术资源建立起强大的校友网络,同时也培育了一批人文交流的“译者”,为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本文结合第一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拟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 成为中国文化的“译者”,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在哈佛-燕京学社筹备期间,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曾起草过一份哈佛备忘录,建议学社未来应致力于东方艺术研究和考古。^① 汉学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很早就成为哈佛-燕京学社的重点研究目标。基于此,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开展项目期间,不仅挖掘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而且在美国掀起汉学热,为近现代美国的中国研究打下基础。

一方面,哈佛-燕京学社支持美国学者赴华进行汉学研究。据统计,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发展的黄金十年,有 20 多位美国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号召和资助下来华留学访问,其中不乏费正清(John Fairbank)、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专家。^② 彼时美国学界掀起了汉学热,许多关键汉学研究成果得以面世。例如魏鲁南(James Ware)英译的《孟子》和《论语》,帮助中国哲学典籍“走出去”,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经典思想文化的窗口;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在两次赴华留学后写出的《中国传统史学》是第一部由美国学者著成的有关中国传统史学史的书籍,在西方汉学界具有开拓价值。即使是在回国后,这些访问学者依旧肩负起发展哈佛东亚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责任使命,在哈佛大学开设中国政治史等中文课程,成为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先驱者和贡献者。

另一方面,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宝库。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是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汉文文库”(Chinese Collection)。^③ 因此可以说,对汉学资料的收集与保存一直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重心。1929年,由洪业等人联名起草的《哈佛-燕京学社备忘录》建议将图书资料建设作为学社的重点工作。^④ 在得到高层许可后,哈佛-燕京学社不仅出资援建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 6 所合作教会大学的图书馆,而且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设立哈佛购书处,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原名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代购添置中文藏书,其中不乏珍贵孤本。这一时期内,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哈佛购书处获得的藏书包括古籍善本、地方志、新文化图书,极大丰富了亚洲研究的资料,对后续学社发展乃至整个美国的汉学研

① 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第 28~33 页。

② 张凤《哈佛-燕京学社 75 年的汉学贡献》,载《文史哲》2004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③ 王蕾《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历史研究》,载《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 年第 6 期,第 102 页。

④ 王蕾《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1928~195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306 页。

究打下了基础。^①如今,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大学中收藏东亚文献最全面的图书馆,共有藏书150多万册,其中包括90多万册中文书籍,中国地方志、满文、蒙古文和藏文资料一应俱全。^②如今,哈佛燕京图书馆尤其欢迎各地学者进行访问研究,成为新时期汉学发展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助力。

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现代中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美国汉学家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发展,利用翻译、注释、评论等方式,将中国的经典著作和文化遗产引入美国学界和美国社会,为中美之间架起了一座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扬提供了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哈佛-燕京学社秉持纯粹的学术志向,努力做好中国文化传播的“译者”,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支持者、先行者,通过派遣赴华留学人员、建设中国研究图书馆,直接促进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打开了中美跨文化交流的窗口。

(二) 形成学术共同体,打造文化传播的知识平台

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是哈佛-燕京学社打造学术共同体,促进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截至2025年5月,学社已在亚洲地区12个城市举办了26场学术会议。学者们在会议期间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研究伙伴,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形成研究团队,开展科研项目。平等开放的交流机制与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不仅推动了学术成果的高效传播,更促成了一个集学术交流、资源共享与合作创新于一体的学术共同体。学社内部每周举办的多场学术讲座,也成为中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此外,哈佛-燕京学社还大力资助一系列出版项目,为中美两国学者构建起适配的出版支持体系。哈佛-燕京学社通过《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中心出版计划(the Asia Center Publications Program)、工作论文系列(Working Paper)等渠道直接刊登、出版亚洲研究的学术成果。学社还通过与中国出版社合作的方式间接推动人文领域研究成果的出版。^③对学术出版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

① 王蕾《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1928~1951)》,第325~340页。

② 参见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s://library.harvard.edu/libraries/yenching>, 2025.5.20。

③ 欧阳光华、胡艺玲《开放与坚守:一流大学跨国学术共同体探析: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例》,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年第6期,第85~86页。

国学者及其学术研究在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哈佛-燕京学社还会对其校友的学术最新成果进行汇总、介绍、报道,并通过书评的方式帮助中美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将学术成果管理体系与校友网络结合,强化学术共同体意识。

相较于官方和半官方层面的互动,学术交流政治性和敏感性较低。无论是从学者个体的交流实践来看,还是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而言,学术活动蕴含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符号都很明显,是跨文化交流中重要且可持续的实践载体。在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同时,一种跨越意识形态差异的文化共同体也得以构建。不同学者之间的文化身份差异被弱化,文化共性被强调,从而更容易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塑造共有观点。哈佛-燕京学社为构建中美学术共同体付出许多努力和尝试,最终以校友网络为核心,通过学术会议和成果出版的方式凝聚起中美学者的共同体意识,对中美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增进中美文化沟通,建构共有观念。在哈佛-燕京学社组织下,中美学者得以频繁和深入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交流范围不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传递,更包括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互动,增进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有助于减少误解和偏见,促进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中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华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便利。通过共同体合作,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学术资源的互换也为中华文化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方法,并以出版学术成果的方式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认知度。

(三) 建立学社校友网络,培育文化交流的他国“译者”

在跨文化传播路径中,个体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直接,效果明显。哈佛-燕京学社的活动,例如访问学者项目、博士生联培项目以及亚洲研究会议项目,都十分重视个体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近百年的运营,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拥有极其强大的校友网络,培育了一批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和推动跨文化交流的他国“译者”。

当前哈佛-燕京学社的校友遍布全球,覆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范围广、凝聚力强的校友网络。学社不仅依托访问学者项目(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将各领域已有建树的学者纳入校友体系,还通过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为跨国学者网络储备新生力量。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学者因哈佛-燕京学

社会聚在一起,在访学期间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建立合作关系。因哈佛-燕京学社突出的人文关怀和良好的研究环境,访问人员容易形成群体意识和集体归属,建立超越文化壁垒的友谊。即使是在访学结束后,哈佛-燕京学社也经常组织校友聚会,不仅帮助同一时期的校友联络感情,还为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校友搭建沟通桥梁,进一步巩固和扩充学社的校友网络。

其中,作为构建校友网络的重要一环,访问学者项目在沟通中美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厦门大学杨仁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朱虹教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名额。^①截至2024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及博士生项目累计培养了536名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专家,而他们现在也成为各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在访问期间利用哈佛-燕京学社完备的学术资源系统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完成自身研究。独具中国特色的汉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人文著作在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发行。例如樊书华的《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姚达兑的《现代的先声:晚清基督教汉语文学》、陈红民的《异同之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等著作,促进了美国学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为正确看待两国文化异同提供了独特视角及思考。哈佛-燕京学社不仅为访问学者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还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公共文化生活,构建起燕京校友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访问学者访学期间,学社会组织多次参观美国的风景名胜的活动,在圣诞节、感恩节等重要节日举办聚会,营造属于校友的专属回忆,加强学者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因此,带着对哈佛-燕京学社的美好回忆,访问学者在回国后也乐于利用自身社会影响力和学术资源,继续促成中国高校与哈佛-燕京学社之间、中国图书馆与哈佛燕京图书馆之间以及科研项目组之间的合作,通过编织社会网络成为促进中美跨文化交流的友好力量。中华文化也随着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增进中美之间的认识 and 了解,潜移默化地构建起两国共有认知。华东师范大学的唐小兵教授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① 参见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lumni," available at: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role/alumni/>, 2025.5.20.

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合理安排下,会迅速形成融洽而互助的共同体文化,彼此不同的学科背景并不会形成学术上的鄙视链,反而能够促进学人积极扩充学术心量拓宽学术视野的文化自觉……哈佛-燕京学社真正服务于中美学术文化交流。^①

五 哈佛-燕京学社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局限

在其建立后的 90 多年里,哈佛-燕京学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哈佛-燕京学社主要通过与中国教会大学的合作,推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培养体系,扶持中国人文社科的本土研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20 世纪 70 年代与中国重新恢复合作关系后,哈佛-燕京学社通过系列访学项目和会议活动,推动中美两国的学术合作,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中美关系的复杂演变,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的实践逐渐显现出若干局限性。

第一,受到美国文化外交的负面影响。随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高级政治不再成为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唯一变量。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逐渐被学界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播如何影响国际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经历了美苏冷战、“9·11”事件后,“文化外交”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门理论之一。^② 美国的“文化外交”是指通过传播文化产品、发展文化教育等方式,有目的地将美国价值观渗透到对象国,最终影响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利用文化权力实现美国利益的一种手段。^③ 留学访学这类教育交流也被美国外交部门视为一种文化外交的工具。^④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① 唐小兵《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版,第152~153页。

② 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50~52页。

③ 刘永涛《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63~65页。

④ 崔建立《冷战时期富布莱特项目与美国文化外交》,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8页。

升级,文化渗透与反渗透议题敏感且重要。尽管哈佛-燕京学社在法律和财政上独立于哈佛大学,但其主要活动也容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哈佛-燕京学社设立的初衷和目标是:在亚洲人文和社科领域推动高等教育和亚洲文化研究。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哈佛-燕京学社能否保持纯粹的学术性,不成为美国文化外交的附属品,并且利用自身优势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也将影响未来学社的组织命运和前进方向。

第二,对国际关系学重视程度不够。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哈佛-燕京学社的工作重点始终都集中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科领域,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关注和人才扶持相对薄弱。例如在500多名中国大陆访问学者中,具有国际关系学科背景的学者只有5人。^①当前中美关系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构建、文化差异调适、核心议题沟通等,均离不开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支撑,相关研究更是中美跨文化交流向深层次推进的核心基础。此外,中美跨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对兼具国际视野与双边研究能力的国际关系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哈佛-燕京学社对国际关系学的关注不足,不仅导致其学术布局难以契合中美跨文化交流的核心需求,更因缺乏该领域专业人才的深度参与,无法精准回应中美双边在文化互鉴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限制了其在促进中美学术对话中的实际效能。

第三,访问学者单向流动模式的结构性缺陷。哈佛-燕京学社在初建的20世纪30年代,曾支持美国学者赴华开展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形成了早期中美学术视角的初步互动。而后,其访问学者项目逐渐形成以各国优秀人才赴美开展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为主的运作模式,其中中国学者是核心参与群体。该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西方中心主义”,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优质学术资源与国际视野,但本质上仍是以中国学者“赴美学习交流”为核心的单向流动。从中美跨文化交流的本质需求来看,这种单向模式缺乏美国学者深入中国开展中美双边议题研究、与中国学界进行常态化双向互动的机制:一方面,中国学者带着既定研究议题赴美,更多是利用美方资源推进既有研究,而非与

^① 这五人分别是:复旦大学倪世雄、复旦大学潘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琪、南京大学石斌、华南师范大学万晓宏。参见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Visiting Scholars, “Alumni,” available at: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role/alumni/>, 2025.5.20。

美国学者围绕中美关系、文化差异等核心议题开展平等对话与联合探索;另一方面,因为缺乏美国学者扎根中国本土的研究实践,中美学术交流中缺少基于中国现实语境的西方视角反馈,难以形成“中国视角”与“美国视角”的深度碰撞。这种单向流动的结构,既不利于双方学术观点的互鉴融通,也限制了学社在促进中美双向文化理解中的深层价值。

六 结 语

本文通过研究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发现国际学术组织独立性较强,敏感性较低,是中美官方层面文化交流的柔性补充。作为一家致力于推动亚洲研究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始终秉持初衷,顺应时代变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在过去,哈佛-燕京学社建立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东亚系和学术期刊为亚洲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平台,推动了中国汉学“走出去”。如今,哈佛-燕京学社已为中国大陆 500 多名访问学者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客观上培育了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知名学者,以一种更加强调文化多元化和合作平等化的方式促进中美学术交流和文化互动。

当前中美两国正常人文交流面临严重阻碍。2018 年美国启动“中国行动计划”,企图从科技、学术、商业层面遏制中国发展,在学者群体中引发“寒蝉效应”,^①干扰阻碍两国人文交流;2025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取消哈佛大学的国际招生和交流学者项目(SEVP)资质。因此,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升级、两国关系恶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曾经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跨国性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的人文交流和学术项目更需持续推进。

展望未来,对中美两国政府和学界而言,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发挥好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组织在增信释疑和促进中美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哈佛-燕京学社而言,需要在保持纯粹学术性的同时承担起跨文化

^① 万晓宏、林岳明《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44 页。

交流的重任,做中美人文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时借助学术活动促进民心相通,增进相互理解,消除文化差异导致的错误认知,共同成就中美友好这项伟大事业。

万晓宏: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黄伟帆: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教

(本文责任编辑: 仇朝兵)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Sino– U.S. Relations

The Evolution , Challenges , and Prospects of th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ovement

Liu Chunpeng (117)

Since 2016 ,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onald Trump , th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movement has undergone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evolution. As a convergence of ideological currents ,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 and mechanism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 MAGA ’ 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can be systematically delineated into four phases: identity-based mobilization , intensification of crisis narratives , institutional expansion ,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agendas. The movement is currently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and renewal ,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rapid political ascent of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and the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among key opinion leaders. This shift has led to a noticeable trend toward greater youth representation and demographic diversity among MAGA participants. With Trump ’ s re-election in the 2024 general election , the identity of MAGA supporters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from being anti-establishment actors operating outside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to emerging as a central component of the governing establishment. However ,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introduced a range of challenges , including heightened internal factionalism and power competition , evolving dynamics between Trump and the core base of the movement , and growing tensions between personalistic leadership and institutional consolidation. Looking ahead ,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the MAGA movement will critically depend on three factors: the role and limits of religious influence ,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ra-movement factional integration , and the 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A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in China–U.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n Xiaohong and Huang Weifan (149)

In the circular communication model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first , acting as interpreters of their

own national culture; second , providing media for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third , cultivating interpreters of the target country ' s culture.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28 ,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s gone through four developmental stages: it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in adversity , suspension and reform , and resum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Eventually , it has developed three signature activities: visiting scholar and doctoral student training programs ,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s ,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as well as librar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s not only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cilitated th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culture , but also leveraged its strong alumni network to cultivate friendly forces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people-to-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establishing an academic community. Although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ill has limitations in China-U.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present ,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represented by it still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promote China-U.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foster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ld War History Studies

New Exploration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Review of *Economic Vortex: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Reinterpreted*

Niu Jun (177)

The book *Economic Vortex: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Reinterprete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oncerning major economic issues-includ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Soviet-German War in 1941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d War order in 1947. Th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ofound impact of U.S.-Soviet economic policies and interac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system has never been previously attempted , either domestically or internationally. The book ' s central